

02'98.2

(总第七十八辑)



要
目

●怀念宋景毅同志

●战友·伴侣·知音——忆杜新波

●天津文史资料工作记实

●奉献之歌——李慎之的生平事迹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顾问:黄炎智 田桂林 杨大辛
主编:方兆麟
副主 编:丁立松 张笑平
编辑:李国丽 张 柱 康 明
冯宏友 周桂兰 仇志刚

本辑执行编辑:李国丽

本辑版面编辑:康 明

第一读者:张敦书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8·2(总第七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武清县长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56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2569-4

K·338 定价:5.50 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8·2(总第78辑)

人物春秋

- 怀念宋景毅同志 吕鸿尊(1)
任财政局长时期的宋景毅 王悦珍(16)
战友·伴侣·知音——忆杜新波 陈耀芬(26)
记我的父亲王明 张笑平(35)

时代回声

- 从资本家到劳动者 黄兆黄(43)
伟迪氏制药厂在社会主义改造中 许 钊(54)
我所经历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黄逸民(60)
天津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王 成(72)

史海钩沉

- 天津反日会与抵制日货运动 林开明 李淑芬(86)
记北洋时期天津的两个金融组织 郝庆元(93)

EC30/35

忆在南开大学的二年	戴家祥(101)
李麟玉先生事略	刘炎臣 王慰曾(105)



游子难忘国土情

——一个美籍华人工程师的传奇	陈孚华(112)
----------------------	----------



天津文史资料工作纪实	谢天培 乔维熊(141)
我与文史资料工作	袁东衣(155)
采访“旧闻”三十年	柴寿安(162)



奉献之歌——李慎之的生平事迹

.....	田桂林 刘鸿涛 刘喜春(178)
党的光辉照耀我走革命路	李媛生(188)

封面照片说明	(100)
--------------	-------

吕鸿尊
☆

怀念宋景毅同志



宋景毅同志

我与景毅同志共同生活了40年，他离开我们已13年了。历历往事随他的音容笑貌，经常一件件涌现在我的面前，难以忘怀。现在回忆他在天津任市财政局局长、市建委主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期间，为民造福，清廉从政的事迹，从中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科学、依靠干部群众、技术人员搞建设、抓经济，学习他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严以律己的优良传统。

一、奋力除“三害”

1952年春，城市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市委决定调当时任市财政局局长的景毅同志接替吴砚农同志兼任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在交接工作时，砚农同志诚挚地对景毅同志说：“我主管城建工作

3年,比较满意的一件事是发现和聚集了一批人才;遗憾的是严重危害天津环境卫生的‘四害’(四害指赤龙河、蓄水池、金钟河和墙子河),我只除了一害,1950年把赤龙河填平,得到了根治,其他‘三害’的清除治理任务交给你了。”景毅向砚农同志表达了决心,他说:“老‘除三害’(指京剧除三害),已经唱了多年;咱们一定要在天津唱好一出新‘除三害’,决不让天津的‘三害’再毒害人民。”

从1952年开始,景毅同志就以很大精力组织“除三害”工程。新“除三害”从根治蓄水池工程开始。南开蓄水池是当年帝国主义为营造其在天津的租界,在此取土形成的死水坑。占地130多亩,每到夏天雨季,城厢200多公顷范围内的雨水伴随污水都流入坑内,没有排水出路,坑内蚊蝇孳生,粪便、垃圾四处漫溢,附近居民长期受其毒害,苦不堪言,称之为“害人坑”。景毅一上任就着手规划改造这个蓄水池。在短短两个月内,几次和技术人员到现场勘察,制定改造方案。1952年春,正是“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开展时期,吴砚农同志经常在晚上召集景毅和法院王笑一院长以及市财政局有关人员马驰、王悦珍等到市委机关开会,研究有关“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的問題,往往彻夜不眠,第二天又继续研究治理蓄水池工程规划。就这样经过日以继夜地准备,蓄水池改造工程于1952年5月正式开工。整个工程包括:修筑排水干管1350米,建造五马路泵站,排除蓄水池积水并将其填平,改建成公园(现在的南开公园)。在工地上专业施工队伍与义务劳动大军并肩战斗,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情绪高涨。附近居民也自发地来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七、八月份雨季到来,场地泥泞,施工困难,景毅挤出时间骑自行车奔向工地,在现场指挥工作,还常常同工人们一起挑泥挖土。景毅非常关注施工安全和工人的伙食,他亲自检查指导加强安全工作,增添安全设施,帮助安排主副食供应,改善伙食。工人们看到领导同志对工程如此重视,对工人如此关怀,干劲倍增,在雨水连绵又没有施工机械的情况下,人们站在没腰深的

脏臭污泥中，硬是靠铁锨土筐，肩挑手抬，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没有人叫苦叫累。景毅曾讲，参加蓄水池工程的劳动者，称得起是一支能啃硬骨头的队伍，正是这支队伍保证了工程如期完成。这项工程的主要部分于当年12月初竣工，随后填坑建成南开公园，美化了环境，成为城厢一带居民休息游乐场所。

在改造蓄水池的同时，景毅就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规划改造金钟河。改造工程包括北干沟、南干沟、新开路北段和旧城防河四段排污下水道，总长7.66公里，收排水范围1000多公顷。这项工程于1953年春开工，当年12月竣工，建成了金钟河排水系统，填平了金钟河市内段，修建了14米宽的金钟河大街。由于当时施工设备简陋，没有吊车，尤其是北干沟一段，地质条件差，施工更为困难。景毅就到北干沟蹲点，和工人同吃同劳动，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技术革新，解决施工难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程创造了许多革新成果和新操作法，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在北干沟施工中，由于地质松软，出现流沙，下管工作十分困难，影响了工程进度。有一个施工班长提出了“一条龙下管法”，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改造南开蓄水池和金钟河的同时，景毅不失时机地组织力量调查墙子河下水道情况。1953年确定了治理方案，同年开工，到1954年完成了从三元村到南开五马路一段工程。后又在通往海河共10公里的治理工程中铺设了截流管道，建立泵站、闸门等20余处。动员广大群众义务劳动，挖掘清理污泥，使河水变清，在堤岸上种植花木，设置座椅，在以后十多年间成为市民游憩之地，直至1970年利用河道修了地下铁路，建成现在的南京路。

二、全 心 治 海 河

治理海河是天津市一项重要任务。由于海河是开放式入海，干旱年度海水上溯，加之天津市污水废水尽数排进海河，海水涨潮排



括铺设下水管道 200 多公里,建抽水站 20 座,开挖明沟 26 公里,修通马路 4.74 万平方米,拆迁民房 6 万多平方米。将全市直接向海河排污水和工业废水的 700 多个人口改由五个总管排入污水河,实现“清浊分流”。工程浩大,总投资 8000 万元,仅建闸工程土方量即达 800 多万立方米,工程计划二年完成。

天津市改造海河规划设计方案经上报国务院后很快获得了批准。1958 年 6 月 7 日,天津市人民委员会通过了改造海河规划方案,成立了由景毅任主任,王培仁、赤明、毛昌五等任副主任的海河改造工程委员会。在 6 月 30 日召开的市三届人代会上,景毅作了关于海河改造工程的报告,获得一致通过。7 月 1 日工程正式破土动工,12 月底胜利完成,仅用半年时间,比预期提前了一年半。

工程一开始,景毅几乎天天在工地上,没有休息过节假日,不分昼夜地工作。夏季炎热,他下着短裤,上穿短衫,脚蹬布鞋,头戴草帽,参加工地劳动,有时和机关干部们一起干,有时到群众义务劳动大军中参战。当时河北省和天津市党政领导经常到工地参加劳动,景毅和李耕涛市长同挑一副担,抬一两个小时不换肩,机关的同志们要换换他们,景毅说:我们是老搭档了,不能拆开。工地上的同志们为他们的精神鼓掌助兴,形成团结热烈的劳动场面。

整个工程有 70 多万人参加义务劳动,工地上经常保持数万至十万人的劳动队伍。天津市各行各业全力支持工程建设,送去各种生活物资,文化团体在工地巡回演出,鼓舞士气。各路大军互相鼓励,相互协作,开展竞赛,工地既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建设场所,又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课堂。使参加改造海河的义务劳动成为一代人生活中的一个闪光点,很多同志在近 40 年后的今天回想当时情景仍然抑制不住怀念向往和激动的心情。

三、坚守抗洪一线，保证天津安全

1963年河北省南部、中部连降大到暴雨，造成山洪暴发，洪峰直奔天津。河北省的东淀、贾口洼、文安洼8米以上的水位持续17天。经天津下泄入海的总水量约达192亿立方米，平均每天流经天津的洪水近5亿立方米，而当时海河、独流减河，每天只能下泄2亿立方米，入量大于出量，相差悬殊，抗洪形势严峻。

天津市防汛指挥部于1963年6月12日恢复集中办公，副市长王培仁任天津市防汛指挥部主任。市委、市人委紧急会议决定，8月10日防汛大军开赴抗洪前线，抢修加固堤埝。

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的景毅亲临马厂减河指挥抗洪斗争。根据市委、市人委决定，为了迎战第二次洪峰，解除洪水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严重威胁。景毅任这个指挥部的指挥，贾林、牛勇、王诚熙为副指挥，指挥部设在大港区的洋闸。当时景毅身患高血压、眼底出血，但他带病坚持在抗洪第一线指挥，日夜奋战。他率领12700多名干部和民工、军工于8月20日水陆兼程，奔赴马厂减河工地，分布在黑闸、钱圈、王家房于等长达20多里大堤上。景毅和王诚熙、王刚、徐明久等同志都住在大堤上，与防汛大军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吃的是玉米面饼子、咸菜，开始上堤时为照顾领导，给烙大饼，景毅总是分给同屋的人一块吃。他同水利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群众，共同研究抗洪作战部署。马厂减河指挥部担负的任务是让洪水通过马厂河，从北大港导洪入海，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措施，必须炸开若干个泄洪口门，需用30吨炸药。指挥部做出具体安排，在什么地方炸？什么时候炸？怎样保障安全等，都一一落实。由部队派北海舰队民运部部长王秀民率工程兵，乘橡皮船指挥爆破，民工挖沟，部队战士埋炸药。爆破技术人员来自唐山开滦煤矿等各地区、各单位。8月26日马

厂减河打开12个口门，向大港泄洪。8月27日团泊洼也开始向大港泄洪，从大港泄入渤海相当四个海河的流量。经过紧张战斗，终将这次洪峰顺序入海，天津市和津浦铁路保住了。

在抗洪的日日夜夜里，每遇狂风骤雨，堤埝被袭击或出现险情时，指挥部的同志立即随景毅乘船上堤指挥，王诚熙负责安全保卫，王刚负责施工。当时由于马厂减河的工地被洪水包围，陆上交通中断。随即开辟了一条水上运输线，组织机轮8只、木船40余只，运送食品、防汛器材，医生也坐船去给防汛大军看病、送药、防疫、消毒。遇到紧急情况派直升飞机进行联络。

大堤是战场，也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大课堂。景毅在抗洪前线用事实向防汛大军进行新旧对比的教育。他向防汛大军宣讲：“天津是华北五大河系的下梢，历来就是常闹水的地方。解放前历代封建王朝、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没有挡住洪水，任其泛滥成灾。尤其是1939年天津市闹大水时，东淀第六埠的水位刚到7.69米，水就流到天津，市区百分之七八十的地方街上可以行船，有的地方水深达六七尺，积水持续两个多月，低洼处的马路上可以通行载重10吨的大船。阔公馆里的少爷、小姐荡船游水作乐，70万灾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而今，历史上罕见的洪水被我们挡住了，正如群众说，这么大的洪水，要不是新社会，要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几个天津也淹了。过去闹水上下游打架动武，现在上游下游互相帮助，患难与共，互相支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哪会有这样的事。”在洪水威胁面前，各界人民同舟共济，社会秩序井然，生活有保障，人心稳定，治安状况良好。

1963年9月27日，景毅代表中共天津市委、市人委在天津市防汛抗洪总结发奖大会上宣布，抗洪斗争取得全面胜利。他讲道：“抗洪期间全市近100万人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有62万人在抗洪前线，其中民工56万多人，军工5万多人，坚守长达600多华里的堤防；共使用了258万条草袋，48万条麻袋，54万片苇席，15

万立方米石料,300万块砖,4600多华里长的电线以及其他大批防汛物资;新修和维修近400华里道路;架设总长度4200多华里的电话线;财政开支防汛费1787万元。我们依靠这些人力、物力、财力,与洪水鏖战一个多月,终于夺取了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

四、为安排好人民生活呕心沥血

景毅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长期主管财经工作,包括财政、金融、内贸、外贸及市政建设等,这些都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涉及到千家万户。而且各个系统、各行各业的情况不同,头绪较多,工作繁重。他能够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听取各方面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果新解决。尤其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副食品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的供应极其紧张。为解决全市300多万居民的吃饭、生活问题,景毅更是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天津是直辖市,一直靠国家从外省调粮。从1959年开始,从外地调进粮食困难。至1960年初,调进的粮食还不够销售的,原有库存几乎挖空,至6月份,粮食库存只够销售10天的。面对这种情况,景毅心急如焚,寝食不安,有一天晚上,万晓塘书记召集景毅、路达等几位领导干部到他家研究工作,景毅迟至9点多才到会。他向在座的领导说:“因为商量粮食问题来晚了,粮食库存不多,没有粮食吃怎么办?”接着,几位领导就粮食问题谈论起来。由于缺乏营养,他们都患有浮肿病,几个人抬起路来,擦一下小腿迎门骨旁都有个坑。在那几年,景毅为解决全市粮食供应问题,亲自给有关省的领导同志写信、打电话、发电报,恳切要求尽快调粮食到天津。还多次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分赴各省求援、催调粮食。

面对灾荒,中央决定降低城乡居民的口粮和食油定量。国家粮食部明确要求,天津每月的人均定量指标不得超过北京每月人均28.15斤的标准。当时由于各工厂企业生产条件和工种不同,不少

居民原来的粮食定量标准不尽合理，如何正确贯彻中央指示，既要调整不合理定量，又不超过北京的标准，大家意见不尽一致，有人主张适当调整重新核定，有人则主张干脆推倒重定。为此，景毅很慎重，多方听取意见，权衡利弊。他召集粮食局主管局长、市委财贸部部长、市财委主任和熟悉粮食工作的干部共同研究。会上，这位干部建议：如果推倒重来，往往会就高不就低，全市定量指标会超过北京；采取实事求是、个别核定的办法为宜，对确属定量不合理的予以适当调整，对确实定量不够吃的大肚汉可以个别照顾。对这个意见，景毅当场表示晚上征求各区委财贸书记的意见再定。转天，景毅即通知市财委：粮食定量问题，不搞推倒重来，只做个别调整。执行结果，既调整了定量不合理现象，又未超出北京的人均粮食定量标准。

景毅非常关心群众生活，对于粮食供应，他注意解决不同人员的特殊需要，适当给予粮食补助。节粮度荒，人们营养不足，浮肿、肝炎等患病者增多，致使医院治疗任务加重。医护人员工作辛苦，若动手术一般要站立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如抬担架、推尸体劳动量较大，而他们粮食定量较低，每月人均29斤。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王继秋（后任卫生局副局长）找到景毅，要求对医护人员改按重体力标准，每人每月定量35斤粮食。景毅考虑了实际情况，改按每月31斤供应。他倒当即计算了一下，医护人员共2万多人，全年增加粮食50万斤。景毅当场拍板，王继秋很受感动。

对卫生局提出的其他需要特殊照顾的，也一一予以解决，如对住院病人的粮食供应可凭所交的粮食调剂品种，每人每月供应肉、鸡蛋、食油各2斤。对于清洁工人，王继秋提出是否按重体力标准增加定量，景毅考虑如果清洁工人的粮食定量与炼钢工人、建筑工人一样不相宜，可适当予以补助，确定每人每月补助6斤粮食，由市卫生局与粮食局办理手续，每月由各区发给清洁队。全市6000多名清洁工人全年则要补助40多万斤。

度荒期间,为维护社会治安加强保卫,公安人员经常在夜间值班,要求补助粮食。一天晚上,市公安局局长王诚熙向景毅提出这一问题,经商量确定:公安人员晚间值班超过10点的可每人补助粮食2两。王诚熙在市公安局处长会上做了传达,大家很受感动,体会到市领导对公安人员的关怀。此外,当景毅听到河北区副区长张洪反映,因缺少饲料,拉运脏土车的骡马瘦弱,拉不动车时,景毅批文有关部门给河北区增拨饲料粮高粱60万斤。

景毅照顾到方方面面,分别解决不同岗位人员的特殊困难,他自己则丝毫不搞特殊,与人民群众共渡难关。那几年景毅和我都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景毅的粮食定量只有26.5斤,他不够吃,加上工作紧张,经常加班加点,操劳过度,拖着病弱的身躯难以支持。就在1961年11月26日,在市委开会研究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问题时,他突然晕倒。测量他的血压,血压表的水银柱已到了顶头,大夫说:“血压这么高,太危险了。”他是为了解到大白菜受灾减产,供应发生困难,心里焦急所致。当晚市里没有告诉我他在医院急救,只说是有些事情要处理,晚上不回家了。转天,我们家里人才知道他得病的消息。

景毅平日注意积累资料,熟悉财经情况,他既了解下情,又掌握政策,处理问题果断,不等不靠,不推拖。了解他的同志都赞扬他对群众关心,待人虚心,工作细心,处理问题耐心,遇事讲明应怎么办,不应怎么办,不给下边出难题,有领导风度。他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利用职权谋私利和优亲厚友。那时,很多商品、特别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供应紧张,但他从未为自己和亲友多买一两油、一斤粮、一斤肉、一尺布。他的秘书徐明久穿着补丁衣裳,想买一件衣服,找他批几尺布票,他都耐心说服,不要特殊。

度荒期间,尤其是1960年不仅粮食库存挖空,肉蛋菜副食品货源极紧缺,市场供应难以保证,猪肉库存最低只有20余万斤。1960年3月13日,市里抽调干部成立副食品管理委员会,景毅兼

主任。他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提出“实行低指标，瓜菜代，管好粮食、劳逸结合”，“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照顾特需”的精神和原则，组织副食品生产，全面安排市场。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供应分配措施，如对 11 种主要副食品实行以人定量，凭票或凭本购买，划片、定点、定时供应等。景毅十分重视发展本地的蔬菜生产。他说：“抓蔬菜生产与抓工业生产同样重要，要放到同等地位。”还说：“全国‘以粮为纲’，天津‘以菜为纲’。要认真落实国务院提出的蔬菜生产要‘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划片包干，保证自给’的指示精神。”他经常去灰堆、大毕庄等蔬菜生产基地了解种植面积、蔬菜的长势、产量等；去青光等农场了解粮食、蔬菜、水果、牛奶等品种的生产情况。他深入下去检查了解情况，与大家同坐大轿车，有时还一起骑自行车去。他注意听取各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推广交流经验，经常提出一些新思路，新办法。为鼓励农民种植蔬菜，确定对新开的园田、藕田每亩补助 300 元；安排对蔬菜生产，推广“春提前，夏排开，秋延后”栽培措施，使一年四季都有蔬菜上市；交流改进贮藏、加工技术，以保每年 4、8、9 三个月蔬菜小淡季的供应；召开现场会，交流科学种菜的经验，到年终给予奖励。由于这些措施得力，使蔬菜供应量有所增加，达到每人每天平均 1 斤多，为全市人民度荒助了一臂之力。在景毅的主持下，只有 5 名工作人员的副食品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收到成效，大家很受鼓舞，更加积极出主意、提建议，干得起劲。农科院副院长高级农艺师刘宗樊说：“领导是关键，参谋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当好参谋。”

为了把市场供应搞活，景毅主张开放城市的自由市场和农村的集市贸易，恢复货栈贸易，扩大城乡交流。他亲自去蓟县马伸桥、吴桥县、东光县等地了解农村集市贸易的情况，向县里有关领导干部谈自己的看法，讲清通过集市贸易农民手中多余的农副产品有地方卖，城镇居民需要农副产品也有地方买到。这对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各县有关领导干部来说，是个明确表态。景毅在

1961年初提出天津市恢复长春道副食品自由市场，恢复贸易货栈。通过货栈贸易农村的农副产品来货多了，尤其是果品显著增加。据农民、锦茂、台儿庄和大红桥4个货栈统计，恢复后4个月里，三类果品进货1166万斤，占全市总进货（包括国营专业公司）的74%。

为便于统筹安排全市人民生活，组织好副食品供应，1961年市里决定将原归农口的水产局及其所属单位划归财贸。景毅十分关心天津水产事业的发展，支持水产局开展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水产局反映，由于渔船的维修有困难，影响出海捕捞，要求将渔轮厂由工业口划归水产系统，经市里研究批准，景毅亲自督促有关方面，很快落实下来，保证了渔船及时维修，正常出海作业。为解决渔船捕获的鱼虾卸货问题，经市里专项批准，在陈塘庄海河沿岸建立一个供渔轮停靠的码头，原来占用的单位绝大多数按时搬迁，只有一个地下库迟迟未腾出影响施工。景毅闻知这一情况，立即找其主管部门，限期迁出，以使渔轮卸货码头得以顺利施工。景毅还亲自去南方与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商讨天津渔轮到舟山渔场打鱼，并在当地建立基地的事。经过景毅疏通后，天津市水产局落实时，得到浙江省委、省政府的热情支援，进展顺利。

渔轮船员长期在海上作业，艰辛劳累，生活清苦，对此，景毅于1962年在渔汛前，他主持召开了船员政治工作会，鼓励船员积极出海捕捞，他从关心船员生活出发，明确提出船员们每次渔汛后，回到市里休整，在做好下次渔汛出海准备的同时，要抓紧空隙时间学习好、吃好、玩好。这次会议将参会人员集中安排在国民饭店、交通旅馆住宿，在登瀛楼饭庄就餐，晚上招待观看文娱节目演出。船员们深切体会到领导的关怀爱护，纷纷表示积极上船出海，力争多捕捞鱼虾，在面难时期为天津市民吃鱼做出贡献。谁知，景毅这样做，在“文革”期间竟成为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条罪状。

景毅在工作上注意坚持深入下基层，面查研究，关心群众疾

苦，为基层排忧解难。河西区南华里副食品商店从1954年建店，由于坚持热心为顾客服务，在同行业中保持先进的经营水平，连续10年被评为市级特等模范小组。1964年3月全市财贸系统开展以“南华里”为榜样的比学赶帮运动，景毅即到南华里副食品商店参加劳动。他在柜台内协助售货员粘贴食油票证，边操作、边实际观察体验。当他得知商店营业场地狭小，难以增添品种，而在马路对面有一排危旧平房，可以拆迁改建商场时，就找到有关部门协商研究。1965年一座营业面积400平方米的副食品商店建成。

五、严格自律，清廉从政

在1952年“三五反”运动中，由于景毅廉洁勤奋而被黄敬同志誉为“党的模范干部”。“三五反”运动是党取得政权后第一次对党的队伍进行的一次全面考察，为了防微杜渐，审查极其细密，包括使用公家信封信纸写私人信件都要作检查，要提高到公私不分的高度来认识。而景毅就连这类点滴的问题也没有，可见律己之严。解放初期，财政局掌管接收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资本的财产物资，并负责审批分配给有关单位使用或对外拍卖，景毅作为财政局局长没有利用权力为自己和本单位批过一草一木。他常说：“公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占，这是对党员的起码要求。而作为领导干部，还要有群众观点，对占便宜的事，即便不违反政策，群众可以办的，你是否能办也要慎重。”记得1952年海关要处理一批走私没收的自行车，海关告诉景毅可以买一辆，价格只一元人民币。景毅没有要，他说：“这种脱离群众的便宜事，我们还是不占为好。”一次，有一批进口手表要处理，景毅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想买，由秘书向他反映了这个要求，景毅说服大家，不要利用工作便利为自己谋好处。后来机关有的人通过其他渠道买到了，景毅身边工作人员无一人去买。

景毅历来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安排干部，从不任用个人亲属。解